

诗

性

乐

教

SHIXING YUEJIAO

Qing Si Jing Zhiqiu Xia
Zhongguo Yinyue Jiaoyu Yanjiu

李劲松 著

诗性乐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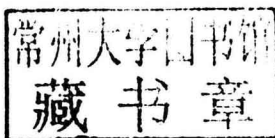
情、思、境旨趣下中国音乐教育研究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诗性乐教

情、思、境旨趣下中国音乐教育研究

李劲松 著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我国传统音乐教育的发展理路是以情感为线索,以体验、口传心授、缄默知识的传递等方式为特征,以“成人”为至高境界,成就“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仁人君子,培养“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志士贤人。但是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速,中国音乐教育的发展路径被生生切断,音乐教育的内涵被实证化倾向所取代,音乐教育的最终目标不再是培养有情感、有情怀的君子和“完人”,音乐教育呈现出平面化、趋同性、单面向等特征。现代性造成的断裂与陷阱深深刺痛着从事音乐教育的有识之士,身为新时期音乐教育工作者,编者在书中以笔墨为经、思想为纬编制出“归乡之图”,在首章中以“诗性乐教巡礼”为底色,继而在第二、三、四章中,对音乐教育的诗性内涵逐一展开详细论证,为读者描绘出音乐教育本应具有感性、灵性等思维品质,以及在诗性品质的合力作用下,音乐教育展现出的勃勃生机和育人画卷;在第五章中,通过对比勾勒出现代性主宰下的音乐教育表现出来的种种病态,继而指向第六章“诗性乐教回归”,深入探讨音乐教育如何走出困境、回归传统,从而走向培养“完人”的意境高远的音乐教育最终目标。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诗性乐教:情、思、境旨趣下中国音乐教育研究/李劲松著. —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18. 1

ISBN 978-7-312-04313-0

I. 诗… II. 李… III. 音乐教育—教育研究—中国 IV. J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18590 号

出版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安徽省合肥市金寨路 96 号,230026
<http://press.ustc.edu.cn>
<https://zgkxjsdxcs.tmall.com>
印刷 安徽省瑞隆印务有限公司
发行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本 710 mm×1000 mm 1/16
印张 10
字数 202 千
版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5.00 元

序

李劲松博士著作名称“诗性乐教”中“诗性”的内涵即诗意。

“诗意”的命题源于19世纪德国浪漫派诗人荷尔德林(Holderlin, 1770—1843)的一首诗——《人，诗意地栖居》。其原诗节录如下：

如果人生纯属辛劳，
人就会仰天而问：
难道我所求太多以致无法生存？
是的。只要良善和纯真尚与人心相伴，
他就会欣喜地拿神性来度测自己。
神莫测而不可知？
神湛若青天？
我宁愿相信后者。这是人的尺规。
人充满劳绩，
但还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
我真想证明，
就连璀璨的星空也不比人纯洁，
人被称作神明的形象。
大地之上可有尺规？
绝无。

荷尔德林写这首诗时已感受到：随着科学的发展，工业文明将使人日渐异化。为了避免被异化，他呼唤人们需要寻找回家之路。此后，经海德格尔的哲学阐发，“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就成为几乎所有人的共同向往。

荷尔德林和海德格尔诸人所倡导的“诗意地栖居”，是旨在通过人生艺术化和诗意化来抵制科学技术所带来的个性泯灭以及生活的刻板化和碎片化。“刻板化”是指现代技术为了生产和使用的方便，把一切变得千篇一律；“碎片化”则指人和自然脱节，感性和理性脱节，人成为被计算使用的物质，成为物化的存在和机械生活

整体的一个碎片。

当前工业文明音乐教育的工具化、技术化所带来的音乐物化的存在,已使音乐教学逐渐成为机械生活整体的一个碎片。本书正是针对这一现状,提出了音乐教育寻找回家之路的命题:“诗性乐教”。

如李劲松博士所言:“在车轮滚滚的现代性铁骑下,音乐教育与诗性的亲密关系戛然而止、生生断裂。断裂表现在变迁速度和方式上,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方式,渗透到音乐以及音乐教育的所有领域,特别是技术领域。断裂体现在音乐教育的思维范式上,用理性思维范式取代神思,取代直抵人心性的直觉、顿悟等诗性思维范式,致使音乐教育的方法呈现出机械性、工具性,音乐教育的面貌呈现出单一性、趋同性。面对生动的音乐现象、音乐画卷,音乐教育本应该为人类文化和人类音乐的丰富多样大显身手,可是当今的音乐教育现状令人揪心。现代性造成的文化断裂,深深刺痛着艰难跋涉而不知通途在何处的心灵旅行者。归乡之路在何处?”

对此,李劲松提出了梳理乐教诗性的内涵:情感、思维和境界生成。

乐教的情感是诗性思维作为本源的品质。诗性思维以中国古琴音乐为例,如《溪山琴况》“诗性的思”中“思”与“诗”是无法分离的,并非西方基本乐理那种纯粹理性“逻辑的思”。境界则是一种“意境”学说,是中国音乐艺术的重要诗性思维。中国古代《乐记》中有“凡音之起,人心生”之句,这一则说明中国音乐的声音不是“物体振动”,而是“生命心灵”的活动;再则,“音”与“心”上下重叠构成“意”字,成为中国艺术美学诗性思维的表征。想想中国唐诗中关于音乐的诗词,哪一首不是以“意境”来生成音乐“意义”的?中国的标题音乐也不同于西方的标题音乐,一则表现为“意象”或“意境”的命题,一则表现为“具象”或“抽象”的命题。

艺术世界是人类超越了无情世界的美好意境与思想结晶。18世纪英国著名的哲学家大卫·休谟曾这样说过:“最能改善人的气质的莫过于对各种诗歌美、绘画美、音乐美的研究,这些美使人产生一种怡人的忧郁感,这种情感最能与他人友善,与他人友善。”诗意地活着,也就是要让生活更加艺术化。

“生活世界”的提出,是哲学家胡塞尔为解救西方工业化所带来的“科学的危机、文化的危机和人性的危机”的良方。《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是胡塞尔生前确定出版的最后的著作,而作为此书核心内容的一篇演讲稿《欧洲人的危机与哲学》,可以说是研究胡塞尔思想的最经典文献之一。1935年的演讲在维也纳取得了出乎意料的成功,听众对于演讲的反响非常强烈。胡塞尔说:“两天以后,我不得不再一次重复这个演讲(而且又是座无虚席)。”

胡塞尔指出:“欧洲人的危机”首先是由科学引发的,或者说,就是科学的危机

(在这里胡塞尔说的处于危机中的科学乃是指具体的自然科学,包括物理学和数学,这些科学形塑了我们今天的世界理解)。他在演讲一开始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作为统治性世界观的现代自然科学的急速发展却导致了人类生活的危机?在哲学的道路上我们如何克服这个危机?

胡塞尔认为:最为核心的“危机”在于,通过“实证主义的还原把科学的观念还原为诸事实科学”,导致了“生活意味的丧失”或者“意义的空乏”,这一切要归因于作为自然科学基本精神的实证主义和自然主义。通过统一的数学抽象形式把握世界,这是伽利略把自然和世界数学化之后的尝试。在这个尝试中,自然和世界不再是数学的基础,而是相反,自然和世界成了数学系统中的一个理念化的集合。

以工业化文明为基础的西方音乐体系和音乐教育,如“基本乐理”同样也是“以数学形式和因果律为代表的自然科学,最终导向对世界整体的一个普遍的形式化把握,追求一个一般的世界、一个空的普遍公式”。笛卡儿和莱布尼茨的“普遍数学”就是这种将世界整体公式化(形式化)的尝试之一。他们“以用数学方式奠定的理念东西的世界暗中代替唯一现实的世界,现实的由感性给予的世界,总是被体验到的和可以体验到的世界——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这种暗中替代随即传给了后继者,以后各个世纪的物理学家”。西方音乐是以音响物理学为方法的,数学则是物理学的基础。

胡塞尔认为:这种纯形式化模式下进行的符号思维实际上抽空了人原本的思维,自然科学的方法“随着技术化而变得肤浅化”,人类在其中丧失了回溯反思的能力。以意义空泛的形式化作为技术的自然科学方法远离了直接的经验直观和起源的直观思维——科学本身的意义来源于这种前科学的直观,但是理念化和形式化的过程恰好隔绝了这个本源。

西方“基本乐理”音乐认知的基础认为:音高就是一种物体振动。于是,音高被对象化和客体化来制作,而非中国古琴音乐那种“音随意转”的“音心合一”以及主体演绎和主客圆融的生成。胡塞尔认为,近代的“客体”观念以及作为对象之总和的“世界”观念通过伽利略和笛卡儿经过了一个普遍的扩展和绝对化的过程。客观主义所把握的世界实际上是以效用为目的的一个理念对象,而并不顾及世界原本的样子。

然而对于现代人而言,我们的存在已经习惯了以自然科学的音乐教育构成的教学和创作方式。正如胡塞尔所言:“我们只信赖量,数量化给我们一种确定感,主体感受能力随之消退;绝对的客观性把人的主体置于次要和附属地位,精神是物质世界的附庸;以因果性和归纳法为基础形成的线性发展观让我们对于技术时代的前景充满自信,从而割断和遗忘了历史……总而言之,降低主体性和精神成为时代

的主旋律。”

我曾在《世界音乐文化的教学》一书中谈到这种“技术时代”所带来的音乐教育的负面问题:“在目前国家高等教育音乐院校的课程设置中,其主要目标是基于一种音乐体系(工业文明音乐体系)及音乐技巧和理论的教育(如乐理、视唱练耳、和声、曲式作品分析、配器、声乐、器乐等教学),即在于一种(数学)形式化的音乐本体教学。其弊端在于,没有把音乐理解为人生活动世界的展开或生成,只将音乐本体视为客观的、技术为本的‘自律’或以此为专业方向的学习进程,并以此构成了一种绝对的或‘纯音乐’逻辑的或音乐本体加上音乐审美形式为核心的‘客观的形而上学’标准,放弃了音乐存在于生活世界的文化意义的学习,形成了狭隘的音乐世界观。”

当今,人类社会正从工业文明的社会转向生态文明的社会,逐渐开始重视“生态文明音乐文化和音乐教育的建构”,包括生物多样性意义上和文化多样性意义上的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建构。科学世界也必须放到生活世界来进行评价,正如今天的科学世界再发达,也必须放到“山清水秀和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的“诗意”的生活世界中来评价。

李劲松博士的“诗性乐教”正是我们建构“生态文明音乐文化和音乐教育”的前奏。“诗性乐教”表明,我们已经在寻找回家之路的路上。

谨以此为序!

管建华

2017年2月

前 言

“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这是诗的生存空间，是音乐的一种存在理由，更是乐教的意义所在，既表达孔子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成人”诉求，又有诗、舞、乐三位一体的音乐思维建构，更近似一种幽幽禅语深深启迪本书的创作灵感。

我国传统乐教的发展理路，无不以情感为线索，以诗性特征（灵感、悟、体验）为思维品格，以“成人”为教育至高“境界”。沿着这条路径回望，我们为一幅幅赋予情感、充满诗性、达成意境的乐教图景所感动，也为20世纪以来的音乐教育发展偏离这条主线而痛心。正如吉登斯所言，“现代性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我们抛离所有类型的社会秩序的轨道，从而形成了其生活形态”。

在车轮滚滚的现代性铁骑下，音乐教育与诗性的亲密关系戛然而止、生生断裂。断裂表现在变迁速度和方式上，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方式，渗透到音乐以及音乐教育所有领域，特别是技术领域；断裂体现在音乐教育的思维范式上，用理性思维范式取代神思，取代直抵人心性的直觉、顿悟等诗性思维范式，致使音乐教育的方法呈现出机械性、工具性，音乐教育的面貌呈现出单一性、趋同性。

面对生动的音乐现象、音乐画卷，音乐教育本应该为人类文化、人类音乐的丰富多样一显身手、大有作为，可是当今的音乐教育现状却令人痛心，结果发人深省。现代性造成的断裂深深刺痛着音乐教育滩涂上艰难跋涉而不知通途在何处的心灵旅行者。归乡在何处？谁能修补那残缺的回乡之路？笔者以笔墨为经、思想为纬织出归乡之图，对传统的珍爱开启思维之宝库，笔尖直指传统乐教开始笔墨论证。

在本书的第一章“诗性乐教巡礼”中，笔者以史料论证为研究手法，梳理诗性乐教的内涵——情感、思维、境界生成，从中国传统音乐论著中理出关于音乐、乐教情感、诗性思维、境界的论据，给全书以学术支撑。接下来的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主要是对乐教的诗性内涵逐一展开论述。在第二章“生命视野中的乐教情感”中，

笔者展开美学思辨,从乐教诗性思维的发生学原理上探寻出情感是诗性思维最为本源的品 质之一,继而立足于古人对乐教、对音乐情感诉求的基础上,对诗性思维中的情感进行分层论述。第三章对乐教诗性思维的又一特征“诗性思维”展开论述,在论述中笔者以古琴为个案,对气韵生动、古琴之韵进行社会学式的调查,重点是以魏晋时期的乐教对气韵的应用和唐宋乐府对气韵生动的深化为视点,梳理出以“气韵生动”为特色的“诗性思维”模式对当下乐教重生的意义。在第四章“乐教的生态‘意境’”中,以中国人音乐境界生成的过程和特点为切入口,深入论证“照面与表现”在中国音乐教育的造境过程中所起的重要和独特作用。第五章“诗性乐教之劫”,主要针对现代性造成音乐教育传统断裂展开反思,聚焦于音乐教育的思维模式、情感模式和境界三个维度,论述现代性造成的音乐思维传统,乐人情感,技与艺三大断裂的表现、特点,以及对当下音乐教育造成的危害;继而引出第六章“诗性乐教回归”,笔者以教育学的学术视野建构诗性音乐教育的逻辑框架结构,深入探讨在终极理想“成人”的指向下,音乐教育中知识体系的构建和知识的对话品性,为境界生成的音乐课程的论述打下基础,对如何实现音乐教育课程的境界作出详细的解说。

李劲松

2017年2月

目 录

序	(i)
前言	(v)
绪论	(1)
第一章 诗性乐教巡礼	(12)
第一节 以情感为发端的礼施乐教	(13)
第二节 秦汉乐府——缘情而起、驾兴而至	(16)
第三节 魏晋时的乐教新气象——寻求气韵、境界的方向标	(17)
第四节 唐代教坊乐事——以境界为旨趣	(20)
第五节 唐代后的乐教思维——氤氲开来、意蕴深化	(23)
第二章 生命视野中的乐教情感	(26)
第一节 情感——生命艺术之符号	(27)
第二节 情感视界中的生命之乐	(32)
第三节 情深而文明——生命视野中的乐教	(42)
第三章 复杂性视野下诗性乐教品质	(47)
第一节 音乐的思维品质	(47)
第二节 音乐的简单性理解	(56)
第三节 开发性音乐教育范式中的简单性思维剖析	(59)
第四节 复杂性视域中音乐教育的诗性思维	(64)
第四章 乐教的生态“意境”	(74)
第一节 音乐意境生成——照面与表现	(74)
第二节 自然——音乐境界的深层解释	(78)
第三节 乐教的境界诉求	(81)
第五章 诗性乐教之劫	(86)
第一节 现代性内涵与中国的现代性特征	(86)
第二节 音乐思维传统的断裂	(89)

第三节 乐人情感的断裂	(92)
第四节 现代性造成的断裂:技与艺的断裂	(101)
第六章 诗性乐教回归	(109)
第一节 乐教·完人	(109)
第二节 知识的选择	(118)
第三节 境界生成的音乐课程	(132)
结语	(144)
后记	(147)

绪 论

思维是人类对自然万物和人类世界的认识和行动方式;反之,外在的自然环境与文化环境又会影响人类的思维方式。东西方不同的自然、文化环境催生出姿态各异的对人、自然的认知方式和行动模式,有共性的一面,也有个性的一面。

中国人所处的暖温带地理位置和半封闭的大河大陆型的自然地域特点,决定了以农耕为主的“靠天吃饭”的生活方式。“天”在中华先民眼中是一个有着好生之德、友善的主宰,作为人类生活方式的文化,不可避免地体现出这种“天人关系”的特点。“天人合一”就是中华先民建构的逻辑大前提,在这个前提下,人与自然的亲和关系被投射到中华民族的心理特征之上,支配着民族文化的走向。翻开中华文化史册,从早期周初的《易经》到春秋《诗经》,都反映出“天人合一”的自然观投影到文化领域的深刻影像,用哲学、文字、语言、艺术、宗教、社会的符号描绘出一幅幅有关“天与人、自然与心性、有机与无机、整一与多元”的天人和谐的整合画卷。那么,天和人是如何合为一体的呢?可参看下图^①:



在道、宇宙(天)与万物之间,中国人创设了一个“气”。“气、阴阳、五行”等核心概念的出现,才使得在天与人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自天达人、自人通天,才能有“阴阳相摩,天地相荡,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动之以四时,暖之于日月,而百化兴焉”。^②

在中国文化中,中介就是那个氤氲浩渺的“气”。因为上下相通,兼具实体与精神二性,“气”使得音韵可以毫不牵强地与生命的形上境界相类比,使万物皆着生命之色彩,使天人之际,一派生机,物我之际款洽融融。在对天的礼赞中,文学、艺术、美学、哲学领域,中国人更是将气深化、散播开来,创造出“气韵生动”,“气韵,就是

① 管建华. 中国音乐审美的文化视野[M].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188.

② 薛永武. 礼记·乐记研究[M].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0:210.

宇宙中鼓动万物的‘气’的节奏和谐”^①,即是创作和鉴赏过程中主客体(创作主客体和审美主客体)之气的“交汇、合一”,是人对自然、天地艺术表现或感悟生成的宇宙情怀和生命情调。在“气韵生动”的内涵中,实质上包含四个特征:一是中国人“以己度物”的思维方式,二是“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万物皆同此情的情感链条,三是“状天地于心胸,化无为有、转无形至有形”的形象性抒写手法,四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生生不息,创新不已”的思维品质。

其实,中国人的这种思维早在两个多世纪以前,就引起了意大利学者维柯的莫大兴趣。在其作品《新科学》(*New Science*)中,这位意大利人以马可·波罗的创新精神和睿智详细考证了中国古代哲学、美学思维与其他民族的远古思维之后,提出了一个概念——诗性思维,以此来表明世界人类文明之初,这种思维模式的重要性、特点以及产生的巨大影响。在他看来,诗性思维产生于人类早期思维阶段,那时人的意识中尚无一般性概念,自我意识与对象意识混沌未分,概念还未从具体事物中抽离出来。诗性思维中的自然不是主客体相对立、与人的存在相割裂的对象,而是人诗意栖居其中的大地,是海德格尔所言的“大地本身”“大地上的万物,亦即大地整体本身,汇集于一种交响齐奏之中”^②的状态。

当然,中国文化的思维方式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原始思维,但比之经历了科学精神洗礼的西方思维来说,它较多地保留和积淀了原始诗性思维的某些特质。在中国文化的较高发展阶段上,仍保持着上述特点。

在西方文化史上,理性思维与宗教精神较早地占据了主导地位,诗性思维和智慧并未成为其主要特征。朱光潜在阐述席勒的美学思维时,曾这样论述:“在古希腊社会的单纯情况里,个人与社会以及个人内部的感性功能与理性功能还都处在和谐的统一体里,利于审美活动和艺术活动的发展;而在近代社会里阶级对立和分工制造则造成了人与人的矛盾以及人格内部的分裂和腐化,极不利于审美活动和艺术活动的发展。”^③从朱光潜的论述中可以看到,席勒指出的感性与理性和谐统一的“素朴”状态,实质上与诗性智慧是相通的,它虽然是属于人类文化发展早期阶段的产物,却是有利于审美和艺术活动的。马克思也曾经提到,古希腊史诗是人类儿童阶段创造的高不可及的范本。

中国传统文化所体现出的,也恰恰是这种诗性智慧的特色。这种诗性智慧表现于自然哲学世界观的天人合一,体现于文化艺术脉络中的诗、舞、乐三位一体,彰显于艺术创作领域的“气韵生动”,表现于文学艺术创设的“境界”之中,也展现于“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教育思想中。从古代的音乐教育来看,乐教就是诗教,

① 宗白华. 美学散步[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97.

② 海德格尔. 林中路[M]. 孙周兴,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45.

③ 朱光潜. 西方美学史.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458.

孔子倾其一生追求“乐教、礼教”，实质上也是期冀凡人、庶民经过礼、诗、乐的教育成为“君子”，以“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在儒家遵从的教育法度中，显然把“乐”放在最高位置，乐可以为器，乐也可载道。正是由于音乐具备情感、比兴、伦理的整合教育功能，才能使人到达立人成事的境界。如钱穆所言：“乐者，更唱迭和以为歌舞，学其俯仰疾徐周旋进退起讫之结，可以劳其筋骨，使不至怠惰废弛；求其血脉，使不至猛烈僨起。而八音之节，可以养人之性情，而荡涤其邪秽，消融其渣滓。学者之所至于义精仁熟而和顺于道德者，每于乐得之。”^①此中之乐和着歌舞程式，化静为动，撩拨个体之全部“生理能”，从而去完成“心理能”之巨大创造。

在中国的礼乐文化中，儒家以“有教无类”之“兴”的民族性方式，去创立乐教、诗教合而为一的教育系统。此间的“兴”是什么？几乎孔子之后，千千万万贤者均用心于此，企图解说“兴”的秘密和妙用。一般来说，“兴”即“兴起”，它不是机械之举，而是全副身心、全部情感的投入和掀动；二是有所附“丽”，借助一定的媒介将情感表达，或取材于诗歌，或钟情于丹青，或抒情于音声，在媒介之外有旨趣；三是“兴”能进入境界，音乐中的“兴”又可以指情感在一定的情境中被掀起，按照一定的路径进入音乐的深层世界——意境。孔子兴诗之目的就是教育、劝导人进入“乐”之境界，体验宇宙人生的乐趣，此乃教育大境界、音乐教育大境界。

上下五千年，乐教思想教诲了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孜孜不倦，诲人不倦，为中华民族的诗性智慧不断进行着新的诠释。而今再论乐教的诗性思维，不是因为我们承接了诗性传统，而是我们的乐教几乎丢弃了诗性，丢掉了乐之道，只剩下载乐之器，丢掉了进入“乐境”的诗性思维，只有在理性思维的奴役下拼命拉车，从不看路的音乐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情感何在？感性何在？境界又何在？带着这些疑问，笔者把本书视点聚焦于音乐教育的诗性思维，开始了构思。

以“诗性乐教”为文眼，出于以下几个方面考量：一是音乐作为人类艺术活动体现出来的整一性，即音乐活动与舞蹈、语言、文学、游戏和礼仪活动相生相伴、不可分割。我国春秋时代孔子提倡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以及古希腊柏拉图的“四艺”的核心理念都是乐与伦理、情感、社会风俗、礼仪，乐与政治兴衰、民族精神的塑造和传承密不可分，而这些联系在人类美育史上闪烁着耀眼的光芒。二是音乐教育的目标是塑造“完人”。“完人”即完整的人，其具备“诗人”的神性思维、“情人”的生态观照等优秀品质，身在此岸却观照彼岸，身牵尘网却心系自然，不受现实所累、不为形名所役，在精神世界里游历嬉戏，技管弦而意逍遥，听琴箫而怀社稷山川。

^① 钱穆. 论语新解[M]. 北京：三联书店，2004：207.

蔡琰远而调胡笳,嵇康烈而抚广陵,陶潜隐而伴无弦,李白醉而咏清平……身陷囹圄而思故乡,遭遇冷落而歌庙堂,处尘网却观照自然,此乃文人、乐士万古顶礼也!彼时音乐教育正是乘踏如此之乐人、乐事而育人至深,达成重生境界。而境界的追寻正是现代音乐教育所缺失、当下音乐教育所秉力追求的内核理念。怀特海曾感叹现代性造成的精神颓废:人在征服自然的征途的某个地方丢失了自己的精神。音乐教育能帮助我们寻回那曾经丢失的精神吗?能造就“赋情之身”“诗人之意”的完人吗?本书以“诗性”为文眼,在分析音乐教育生命情感之发端、神性思维之品性、面向自然的境界生成的结构中寻找诗性回归的路径。

一、本书缘起

本书的主体内容为笔者的博士论文成果,而当初选择“诗性乐教”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源于个人研究志趣和当下学术发展动向,下面从三个方面表述。

(一) 问题意识:基于当下音乐教育现象的反思

纵观百年以来,我国高等师范院校音乐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是:培养具有音乐表演基本理论和表演、教学基本技能及艺术实践知识的高等技术应用型人才,具有较强的声乐、乐器表演能力和音乐鉴赏及辨别能力,掌握音乐作品的分析方法,具备一定的音乐创编能力;具有较强的组织音乐教育教学活动、文艺活动和竞赛工作的能力;具备一定的音乐教育科研能力。音乐教育的核心课程也是围绕着人才培养目标而设置的乐理、视唱练耳、声乐、乐器(含中外器乐)、和声基础、中外音乐史、音乐欣赏、合唱指挥、歌曲写作、曲式分析、艺术概论、舞台表演、舞蹈、音乐教育导论、音乐教育哲学、教育学、心理学等。在中小学音乐教育也围绕着唱歌、器乐、欣赏、基本乐理和视唱练耳等四点核心概念来设计教材及安排课程。

以上可以看出我国的近现代音乐教育把西方音乐的基本理论和技能作为科学的、先进的、合理的音乐教育手段加以学习,把静态知识的传递作为课程的全部。在这样的音乐教育理念指引下,音乐课堂教学模式将音乐教学化简,将乐教思维模式通约,将原本活灵活现的神性思维方式格式化为死气沉沉的逻辑推理的理性思维方式,把音乐限制于工具理性、非人性化的“囚笼”之中,那些曾经感人至真、化人至深、灵气氤氲的神性思维、意境生成的乐教旨趣都被理性的、非人性的、工具性的乐教图景所遮蔽。不见了乐,不见了人!

而今世界各国的音乐教育都面临困境而图破解,如美国、加拿大、德国、澳大利亚、日本的音乐教育的理念、模式都在尝试着革新,有的从多元视角对音乐教育的体制加以变革,有的从本土音乐资源寻找课程建设的突破口,而我国则更有优秀的传统摆在眼前。在我们的思维宝库中,有太多的资源值得我们加以珍视,因为这些情感、思维、旨趣的诗性艺术特质对当下我国乐教来说尤为珍贵,因为它能帮助我们

们走出困境、走向重生!

(二) 个人研究旨趣:兴趣为舵,志趣支撑

笔者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父母皆为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大学毕业生,时代在那一代人身上留下了诸多印记。毕业于俄语专业的父亲在中学教政治和语文,母亲教本行物理兼音乐。受父母影响,笔者幼年就钟爱传统艺术,如书法、诗歌、国画,现在家里还珍藏着儿时成长的“足迹”——许多书法、诗歌比赛的获奖证书,回想起来似乎冥冥之中上苍已经做好安排,规划着笔者的求学之路。笔者的小学求学时期正处于改革开放的大变革时代,知识界、教育界正沐浴着和煦的“美育”的春风,迈步走进“美育”的春天,儿时熟记的唐诗、宋词在中国传统美学的诠释下有了更深层的体悟和感受——情感和意境对诗词和文章来说犹如人的眼睛和灵魂,如此珍贵和迷人,又如此引人入胜。

涓涓溪流汇成沧海,在时间的催化和酝酿之中,儿时的兴趣潜滋暗长、不可抑制,终随时机成熟自然成型。当笔者的学术视点扩大到足以纳中西方音乐教育于视域,兼具哲、史、文、美等学术视野之时,笔者的研究再一次聚焦于“诗”“诗与音乐教育”,这一次近现代中西哲学的借用和吸收给了笔者启迪:海德格尔“诗意地栖居”对老子“道”的诠释和意义的延伸实际上为欧洲走出现代性、工具理性的阴影指出了一条“道”,一条形而上之“道”,也为当下的教育留下了一则“警示寓言”,为如何走出现代性给教育、音乐教育设置的陷阱点燃了一盏明灯。同时“诗”“诗性”的另一方又连着孔子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乐教,那赋情于身、神性思维、意境迭生的大乐系统正以独出机杼的结构启迪着处在现代性困境中的音乐教育。

“诗性”仿佛就是本书的那双眼睛,通过那双诗性之眼,笔者清晰地看到了一条潜藏于中国传统乐教图景背后的有机链条:情感—神思—境界。沿着这条线可以把中国古代以“神气”为特征的音乐传承思路串联起来,也较为准确地诠释了中国古代乐教“诗性”思维的特征,对当下的音乐教育更有新意,表现为:用后现代视角关注“诗性乐教”,关注生命状态中音乐教育的情感性、复杂性状态中音乐教育的思维模式、音乐教育的境界生成。以这样的思路进行论述将更有针对性,因为它抓住了现行乐教陷入困境的根源,继而又寻找出突破“围城”的理路。

(三) 基于对传统音乐教育思维品质的思考

其实之所以聚焦于“诗性”,除了偏爱和志趣外,还有对音乐艺术独特的品行的思考:在人类古代文化长河中有这样一种传统思维——诗、舞、乐三位一体,相生相依,不可分离。古希腊的“四艺”“七艺”,印度的“卡纳提克”音乐,中国的宫廷“雅乐”“燕乐”,缘于黑人的“爵士乐”等,这些音乐形式都传达着一种声音:音乐与情感、伦理、世界观不可剥离。

自古以来的乐教都秉承这样一个理念,音乐教育培养人,培养一个有情、有思

维力、有灵气、全面的、理性与感性并存的人,这犹如中国文论中“言、象、意”的关系,三者虚实相生、意生无穷,方能引人入胜。音乐传承也遵其理路,古琴的乐谱解读、创作演奏、欣赏习得都是虚实相生、灵感随至、意境陡现。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古代音乐教育的特征,只不过中国乐教以自己独出机杼的架构和品性更加清晰地传承下来并标注于世,以“实”为象、“虚”为旨趣,以音乐作品为“象”,传达出无穷的旨趣,言在作品之中而志在作品之外、课堂之外、学校之外,身居一隅,却胸怀天下的君子仁人之境界生矣!

这里引用钱穆一句比较中西戏剧的话:西方戏剧求逼真,说白动作,完全要逼近真实,要使戏剧与人生不隔,但中国戏剧则只是游戏三昧……中国戏剧、音乐从来都是不断地从世俗的生活情境出来寻求完满的表现、寻求现实人生的寄托。正是在对这种言不尽而意犹存的艺术和人生旨趣的追求中,音乐教育才真正彰显出自己的“道义”,而对现行的乐教来说,只重技术而无视情感,只重视理性逻辑推理无视音乐的神性思维模式,只有技术却不见“境界”,“目中无人”,“乐(yuè)而不乐(lè)”,这些当下音乐教育的顽疾令人痛心疾首,已经到了要根除的时候!

说到这里,想用“文以载道”来表白心境,文章最难能可贵之处不在于“文字”,而在于书写文字的胆量。诚如张载所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乃知识分子所敢担当,所应担当!

二、课题的研究现状及趋势

目前国内外对“诗性”思维范式转型的研究中,以诗性思维研究音乐教育的成果尚不足,但以音乐的情感、音乐的非理性思维、音乐的境界为视角,学前教育的诗性思维的研究则有一定的研究成果,以下做详细论述。

(一) 对非理性思维模式的研究

(1) 研究通感、灵感对音乐创作、音乐表演的影响。这类研究多采用下定义、解释现象和因果分析的研究手段,如:陆小玲的《通感与音乐》(《武汉音乐学院学报》1996年第1期),平心的《试论舞感、乐感及其通感:兼谈情感、美感和灵感》(《北京舞蹈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史红彬的《音乐艺术中的通感现象》(《沈阳音乐学院学报》1996年第1期),史红彬的《谈通感在音乐创作与欣赏中的审美价值》(《艺术研究》2003年第2期),史红彬的《试论音乐创作与音乐欣赏中的通感》(《中国音乐》2004年第4期),以上研究成果中对音乐的通感、灵感等非理性思维有相应介绍和论述,均侧重于从心理层面对通感等思维的产生、音乐中的表现做探究,没有从民族心理层面进行划分和研究,也没有就这些非理性思维对音乐教育的影响进行梳理。

(2) 从民族心理运行模式和心理特点来剖析非理性思维对音乐创作、表演带来的影响和因果关系,如:周武彦的《论“至乐无乐”音乐审美观:兼谈音乐审美中的